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七十五期（总第 325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9 年 9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要目

●卷首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感动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特刊

港报看中国 60 年衣食住行：未来应着眼软体系建设

中国国庆 60 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回望中国经济六十年

60 年，中国社会思潮再回首

我亲历的两段金融巨变

元勋后代忆述开国大典鲜为人知故事

三种前景：中国未来 30 年

●卷首语

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感动 文/大可

60 一甲子，祖国同峥嵘。总有一些人和事会被历史铭记，他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光荣与梦想，欢笑与泪水，这一切都记录在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共和国 60 年华诞，让我们重温这份骄傲。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60年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新中国成立这一个甲子以来的不平凡历程，充满奇迹，充满辉煌。60年转瞬即逝，但是在这岁月中总有一些瞬间让你记忆犹新，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感动。

是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今日成立了”？还是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刻？是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还是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乔冠华在联大的仰天大笑？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舷梯与周总理的历史性握手？中美发布联合公报？还是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1990年12月19日，上海浦江饭店一声锣响，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还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发表系列“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启大幕？是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还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2006年5月，全长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还是中国“神七”上天，宇航员出仓开启中国太空时代？是充满悲壮的5·12汶川大地震中那位年轻战士托起素不相识的婴儿？还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的瞬间？

是啊，都是！这一切都是共和国60年精彩的瞬间带给我们的感动。每一个瞬间都在告诉世人，中国真正从“东亚病夫”变成了“金砖四国”之一；我们，真正从“东方睡狮”变成了一个用自身力量影响世界的主权国家。我们有过天灾人祸，我们也饱经内忧外患，它们给我们痛苦，也给了我们坚强。60年，共和国这艘巨轮闯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60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共和国这艘巨轮扬帆远航。60年，一个甲子；60年，一个“翻身”。中国人，在全世界，有了自己的尊严；而一个人的尊严，无疑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活意义之一！

如今，世界还深陷于金融危机之中，但是，别忘了，共和国这艘巨轮在前行的60年中，曾用手中的三大法宝击退了从1949到1997到2008发起的三次金融风暴啊！

大喜的日子，我们不能忘，1935年，方志敏曾经在敌人的牢房中憧憬“可爱的中国”，同年8月6日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今天，这样一个“可爱的中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站在历史的起点回望，发生过的一切熟悉又陌生。尽管历史的轨迹从来不因旁人关注的目光而改变，但是只有体味过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独立和现代文明进程的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今日的中国。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力求在缅怀之外，得以管窥国家和民族绵延至今，不断趋向现代的内驱力。

缅怀60年的光荣与梦想的实现，是为了寻找一份精神力量，以便手挽手更好地走向未来。走过共和国的60年，再走过40年，进入2049，就是新中国百年华诞，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在描绘那时的现代中国图景。我们将目光放在未来，带着60年瞬间迸发出的力量，去思考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生活一个个领域的宏大命题，并坚信它百年的美丽。那时，我们也许不能

欣赏共和国百年华诞的焰火绽放，但后来者会一一解读我们今天的光荣与梦想。

●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特刊

港报看中国 60 年衣食住行：未来应着眼软体系建设

香港《星岛日报》21 日刊文梳理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粮票、布票比钱更重要的时代，走到今日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系的历程，投射在衣食住行方面。该文引述香港学者的评论指，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进行了三十年的物质建设，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知识、文明，此后中国的着眼点是软体系的建设。

文章摘录如下：

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从粮票、布票比钱更重要的时代，走到今日，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系，国力提升，物质日渐丰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投射在衣食住行方面。新中国建国时人口有 5.4 亿，单单解决温饱及穿衣问题，已是很大的挑战。

在五十年代中期，先后实施布票制和粮票制。一九五四年九月政府对全国棉布实行计划收购与分配，民众凭票领布，当时统一供应的布料颜色不多，以俗称“老三色”的灰、蓝、绿最普遍，所以西方传媒称呼中国人做“蓝蚂蚁”。

当时的政治气氛，也影响老百姓追随领导人穿中山装，后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为了展示改革精神，成为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国家领导人。而布票制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取消后，中国人民可以自选衣服。

《物权法》成划时代转变

至于粮票制由一九五五年实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按年龄和工种发放粮票，凭票到粮站换取粮食。证件照片收藏家许善斌形容粮票是救命票，比钱更重要，“因为没粮票得饿死，没有钱穷也穷不死。”

到了一九九三年二月，国务院正式取消粮票制度，标志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老一辈的中国人对“福利分房”，“等”国家建房子，“靠”组织分配住所，“要”单位分房子并不陌生，这些名词随中国住房货币化、商品化后成为历史。楼市炒得热烘烘，其后要中央进行宏观调控，介入市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说：“二〇〇七年通过的《物权法》更是划时代，让中国人能够实现安居的梦想。”

同样是划时代的转变，还有民众可以私人拥有汽车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以前，政府禁止私人拥有汽车，即使官员使用的车，都严格按等级实行分配，所以单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成

为内地主要代步工具，更喻为家庭财富“三大件”之一。国务院在一九八四年二月才颁令容许一般人拥有汽车。

叶国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进行了三十年的物质建设，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知识、文明，此后中国的着眼点是软体系的建设。”他认为这对中国的领袖、政府、执政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中国国庆 60 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邱震海

新加坡《联合早报》21 日刊出邱震海文章《中国国庆 60 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到最近 17 年的市场经济，中国正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版本。这其中也涉及如何提炼和整合自身文化，从而在内部持续现代化、对外建构国际秩序方面探索出新路子。

文章摘编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一般来说，面临的问题，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时面临的问题一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六十年建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在哪里？二、这六十年中国主要做了些什么？三、未来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百年衰败：多种救国尝试

首先，就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事情到这一步显然还不够，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放到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当时，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林林总总。但 19 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于是，20 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哪一场革命，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现代化：技术、制度、文化

由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局限，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国的人们，曾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这是历史的遗憾。所幸的是，这个遗憾终于过去了；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初不但迎来了崛起的时代，而且也由于台海两岸关系缓和而迎来了民族和解的时代。

然而，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在救国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并没有因崛起而完全消失，那就是：一、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元素？

从技术到制度的困惑

谈到这里，自然就已经切入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过去六十年中国做了些什么？

必须承认，过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续救国之梦；到了后三十年，中国进入了成功改良的时代。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过去近百年血雨腥风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

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虽然时空背景不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却一如既往，即都是为了达成国富民强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两者也颇为类似，即都以学习、追赶西方为目的，两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当然，与洋务运动相比，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决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场经济，用“五四运动”时的话来说，中国正在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虽然这个制度主要还只是经济制度。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这个制度自然包含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从日本开始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西化”的代名词。

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现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版本。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争论，都印证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阶段时所无法回避、短期内又难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文化整合无法绕开

这个困惑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间，不但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如何提炼和整合自身文化，从而在内部持续现代化、对外建构国际秩序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时期，由于国力衰败，“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既成了时髦，又成了迫切而又无奈的需求。但随着中国至少在经济上的再度崛起，尤其当中国的发展从技术转向制度层面时，就再度遇到困惑。在试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时候，如何整理、梳理、提炼和整合中华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如何调整，等等，都将迎刃而解，或至少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个问题显然非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但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时候了。

回望中国经济六十年 吴晓波

六十年以 1978 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后三十年，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客观而论，建国者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

1949 年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 68.4% 来自农业，工业仅为 12.6%。在工业领域内部，手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 70%。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基本无电力供应。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 1.1 万公里。全国人口中的 80% 是文盲，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真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更棘手的是，物价飞涨人心动荡。1949 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的货币发行额从 185 亿元增加到了 4851 亿元，增加了 25 倍，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多月里，京津物价涨 1.8 倍，上海涨 1.5 倍，民间资金几乎全数用于疯狂投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权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政策。先是关闭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全面打击金融投机商人，继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这个庞大的生产和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多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从 1952 年到 1976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 1.8% 降低到 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 18.5% 提高到 45.3%，每亩使用化肥从 0.2 公斤增加到 19.4 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 129 倍、煤产量增加 15 倍、发电量增加 47 倍、石油产量增加 726 倍、化肥产量增加 874 倍、水泥产量增加 71 倍、粮食产量增加 2.5 倍、棉花产量增加 4.6 倍。中国的铁路里

程增加 2.2 倍、公路里程增加 10.2 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 1.9 倍和 8.6 倍。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 1952 年到 1978 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 1.7%。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对亚洲各国人均 GDP 增长率的计算，在 1952 年到 1978 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是 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 1952 年到 1978 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到 1970 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已经毕现无遗。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彻底厌倦于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了。据胡鞍钢的统计，从 1949 年到 1976 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 67 次，平均每年 2.5 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连绵而至。

1978 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瓦解。而变革的突破口正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在体制外全面展开的。一直到今天，众多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性体制已被打破，但是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产业中，旧体制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变革路径，从而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 GDP 增长率达到 6.6%，出口增长了 28 倍，出口占 GDP 的比例从 4.6% 上升到 26.6%。最具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在 196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1457 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 1977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而到 2009 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 7% 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建国 80 年的时候，超过美国而成全球第一。

六十年的发展，让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崛起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不过，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很多病症却并未完全消解，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铁矿石的“间谍门事件”、到石首抢尸

体事件及通化钢铁的陈国军致死事件等等，都可以看到矛盾之丛生、利益之分化及变革之艰难。

站在建国 60 年的坐标点上，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我们要问的是：在国家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建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和谐成长的社会？那些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体制难题是否已经一一化解，或者已经找到了化解的路径，以及具备了化解的勇气和全民共识？这是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社会吗？我们有健康的价值观吗？我们是否从过往的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

这些问题，在建国 60 年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有远大的前程，却从来被苦难折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60 年，中国社会思潮再回首 徐友渔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届六十，其中后 30 年是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快速转型中度过过的，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也是剧烈的，思想上的交锋也是激烈的。在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思想分化与对立将进一步发展，而思想的走向又将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新时期思想的起点

1978 年兴起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和分水岭，在中国，人们第一次可以面对实际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而不是只能战战兢兢、不折不扣地按照政治领导人的指示办事，它使得中国真正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成为可能，为极为艰难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不过，应该看到，中国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30 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也不彻底——前两年在广东又出现“解放思想”的呼声而且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就是证明。从根本上说，思想解放应该是思想、学术、文化界自发发起，开展到全民的运动，而 30 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上层发动、与人事变动密切相关的官方运动，它受制于上层的意愿，所以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出现时放时收、时松时紧的状况。

30 年前的思想解放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能坚持始终就好了。有两个方面是涉及根本、关乎全局的，尚待人们现在和今后的努力。

当时思想解放面临的任务是要彻底认清毛泽东晚期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要彻底分清文化大革命颠倒的是非。但是，结果是另外一种思路占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革

命事业的一把“刀子”，深入的认识和批判会“丢刀子”，对文革的认识和清算，也“宜粗不宜细”、“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结果，这 30 年间左的思想不断回潮，改革开放时常被干扰，出现反复、曲折。

思想解放期间，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黎澍等学者曾大力提倡肃清封建专制的流毒，发扬民主主义，这种工作非常重要，需要长期坚持。可惜，这种努力很快就被其他事情、甚至是相反的倾向所压倒。后来有人想做补课的工作，但并不顺利。

90 年代风潮的转变

如果说，80 年代思想的主流倾向是启蒙、科学、民主、理性，向外学习一切先进、有益的东西，批判自身的错误和不利于现代化的种种传统，那么 90 年代则出现了一种对于 80 年代思想逆转的倾向。

首先是在 90 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的大行其道，它把 80 年代的理想、热情和对现代化的追求都当作“宏大叙事”进行嘲弄，它把近现代以来成为中国人共识的科学、民主、启蒙、理性等等当作西方话语霸权的表现加以批判，它甚至把一般的道德、规则、意义概念加以消解。其实，后现代主义在 80 年代就被引入中国，但没有得到多少注意，是 90 年代初对 80 年代思想文化氛围的批判为它的快速生长提供了温度与土壤。

与后现代主义近似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伊德的观点为代表）、西方新左派思潮同时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们都对 80 年代的启蒙和现代化思想大加清算，甚至把批判的火力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之，把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努力说成是屈服于西方殖民和霸权话语。

今天很多人认为，“国学热”兴起于 2004 年的“少儿读经”口号，其实，这已经是当代“国学热”的第二波，第一波大潮涌动于 1993 年，这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但这一波“国学热”很快遭遇政治大帽子和大批判，戛然而止。有人以正统和卫道的面目站出来，指责国学的倡导者妄图用复古主义和国粹取代马克思主义。

90 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思想交锋发生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80 年代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共识已然破裂，对于全民关注的社会不公正、贪污腐败原因的诊断和救治方案截然不同，一方认为问题出于市场经济，应遏制市场的作用，另一方认为问题是市场不规范，权力的干涉和垄断，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首要问题；一方认为全球化是祸，国际资本导致国内腐败，另一方主张对于必然到来的全球化只能勇于面对和参与。

民族主义成为主潮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不时呈现出狂热性和爆发性。可以预言，民族主义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是支配多数民众的思潮。

民族主义是在 90 年代初冒头的，经历了 80 年代末的巨大风波之后，知识界一些对时局敏感的人觉察到某种信仰和意识形态真空，他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提出应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填补这种真空，借用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弥补原有意识形态的不足。最初集中表现为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可以解救西方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精神和信仰危机，到了 21 世纪，将不再是中国人借鉴、学习西方文化，而是西方必须乞灵于中国文化才能克服自己的困难。

季羨林先生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 年河东，30 年河西，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可能马上就要到了。他还说，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知识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而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他主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摩擦和冲突的出现，民族主义也以狂放、粗野的形式表现出来。1996 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美国青年一代堕落，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 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2008 年 3 月以来，由于境外传递奥运火炬遭到袭击，国内许多地方发生力图封杀家乐福的事件，这次事件充分利用网络 and 手机短信作为联络手段，取得快速动员的效果，但其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2009 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反映出情绪从愤懑到自大的变化。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真诚的特征，因为那些鼓吹者、宣泄者羡慕和向往西方的生活，也没有打算为这种主义牺牲自己的利益。

新形势和新思潮

中国的社会思潮随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贫富分化、不公正弊端，在医疗、教育、住房、生产、食品和药品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使人们不因为有改革开放的口号而停止抱怨与批评，大致从 2006 年开始，对改革的总结和反思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主要话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于取得共识的话题。一方面，改革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借行业垄断和出台偏私政策的借口，另

一方面，国进民退的事实和趋势使人担心原来意义上的改革有停滞和倒退之虞。最近发生的通钢事件更是表明问题的纠缠与复杂。

欧美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使中国一些理论家重新思考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讨论未能顺利进行，但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容质疑，思考和探讨将继续和深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有关人权的一系列文件上的签字与承诺使人们打破“中国价值/西方价值”的狭隘框架和二元对立，而着眼与中国与各民族共有的价值与公认的文明准则，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虽然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

各种类型的维权活动成为舆论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事件的过程、性质、结果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个人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在维权活动中不时出现民众和舆论胜利的结果，这使得一些人为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而使另一些人警惕与告诫“民粹主义的泛滥”。对民粹主义的危害和倾向当然应该有认识和警惕，但现在惊呼其危险性未免言之过早和夸大其词。最近出现了一些十分可喜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对民情的重视，对民心、民意的尊重。比如对邓玉娇案的处理，又如云南政府规定不准一出现群体性事件就使用“刁民”、“一小撮”等字眼。政府的理性与明智一定会换来民众的善待，良性循环与和谐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展望未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但也许有理由审慎地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9-09-24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我亲历的两段金融巨变

简历：蒋黎，1925年出生于四川，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曾任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副主席。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与一支解放军护送银元至江汉解放区行署，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工作，解放时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5年离休，曾任总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等职。1991年至2000年任《中国金融年鉴》编委、副主任。

没想到85岁高龄的蒋黎先生和我们侃侃而谈了整整一上午的中国金融。

他原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少小家贫，6个兄弟姐妹仅存他一人。后读武大，创社团、写文章、搞学运；入解放区，始办银行业务，行

程 800 里独自受命运送黄金十斤.....而在众多历史片段中，尤以建国前后蒋黎先生参与统一财经工作和改革开放之初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两段亲身经历最为宝贵。

越谈至深处，越让我们感受到个人史与国家史的不可分割。即便看似枯燥，满眼数据模型的金融业，到了深处，也无不可化为一段段真实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将与蒋黎先生的访谈作为 FT 中文网“见证中国（1949-2009）”专题中口述史系列的第三篇。

“6 个孩子只剩下我”

田毅：蒋老，能谈谈您小时候家乡和家庭的情况吗？

蒋黎：我 1925 年出生于四川郫县，过去叫崇宁县唐昌镇，从我家到崇宁县 40 华里，到成都 80 华里。当时家乡贫穷落后，农业为主，都是小农经济，农民自己有两、三亩地，或租地主几亩地交租子，有的给地主打长工，但地主的规模都不大。商业主要是小商贩，靠肩挑背扛手推。全县几乎没有工业，连手工业比如做布鞋的都没有。县里没有初中，只有两个小学。基层政权是国民党统治，有党棍，还有地痞。

当时经济水平很低生活很艰苦，可以说没有活路。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小商贩，40 岁前后都去世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几个月或几岁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现在活到 85 岁确实非常幸运。当时疾病流行，无医无药，流行肺结核、脑膜炎、霍乱，当时没西医，只有中医的小偏方乱吃一下。

我在崇宁县上的初中，每周末步行过去。1943 至 1944 年在成都树德高中，后来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

风云学生运动

田毅：当时很多大学都迁到内地了，比如西南联大，那武汉大学在四川吗？

蒋黎：对。那时全国一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武汉大学也迁到了四川乐山。当时经济系要学经济学、外语、货币银行、会计学、财政学等。我在武汉大学的前两年还读了些书，后两年就主要做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了。

我能完成大学生活是靠了一位进步华侨同学资助，还有母亲做小工的支持和我自己打工。我在武汉大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45 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了，武汉大学迁回了珞珈山。这时国民党想趁机消灭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于是在蒋管区掀起了爱国进步学生运动。

田毅：从 1946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进步学生运动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您在武汉大学参加了吗？

蒋黎：参加了。我到了武汉后就和同学成立了社团，叫晓原社，就是阅读学习苏联哲学、文学以及解放区的文学和重要文章，出墙报，写文章，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批判国民党。

1946 年底，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引发全国群起抗议，那时我是武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参与组织领导了抗暴运动，在武昌游行。在之后 1947 年春天的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游行中串联武汉市部分学生闯入湖北省政府，后来军阀白崇禧勒令解散了学生自治会，之后大家又重新选举了进步学生控制的新学生自治会。我又去了《武大新闻》当编辑，社团也改名叫人间社，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步运动中。这时能得到更多进步书籍，我们从香港和解放区弄来一些资料，特别是毛主席的报告和文章。

1947 年 5 月，又组织一次大游行，又是冲入湖北省政府。这次游行就带来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6 月 1 日凌晨，国民党军队特务包围武汉大学，搜查进步老师学生，最终打死 3 名学生，打伤了十几个，抓走了二十多名老师学生。这个事件更教育了广大学生，不少曾经中立的现在思想也进步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开了个小书店，从进步的汉口三联书店进书。以文宗和同学为主，我是店员，我们经常跑汉口，自己挑，自己背，当然表面上也买点国民党的书刊作掩护。后来我转为地下为主，没有上过什么课了。这些都是人生的锻炼。

解放区里办银行

田毅：那您是怎么到解放区的呢？

蒋黎：那是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1948 年 5 月，从汉口派人护送过去的。当时一起去的有 4 个人。同时有个任务就是和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护送挑银元的挑夫到江汉军区去——那是一些税款。银元很重，要用箱子茅草装一起。晚上就睡在地上，蚊虫都来了，而最危险的是越过国民党的公路。我到了后被分配到江汉行署工作。

田毅：看来除了学过货币银行学，您和银行真正打交道就是从解放区开始的。

蒋黎：是的。五月份就到解放区去，那时叫江汉军区，我们那属于新成立的机构，工商管理、税务、银行，三个机构一体化，十几个人。其中的银行叫金银科，我们的科长是华东来的新四军老干部。我是刚刚毕业，被任命为主任会计，会计我还懂得一些，在武大学习了货币银行学嘛。一共四、五个人就是银行了。

田毅：您能否介绍下解放区金融业的总体情况呢？

蒋黎：早在 1931 年 11 月的江西瑞金，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决议，并发行了货币。1948 年 12 月 1 日，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解放区几个银行合并起来的，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政务院直属单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建立了很多分散的根据地，逐步也就建立了分散的银行，比如华北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当时银行比较分散，而且各自发行

各自的货币，在所管辖区域流通。除了发行货币进行交易外，还有小额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商贩。这时国民党的钞票法币、银元和解放区的货币共同流通。

田毅：那么，您怎么到中州银行去的呢？

蒋黎：1948年后成立了中州银行，总部在河南开封，发行了辅币，就是小币。原来没有中州银行，刘邓大军南下深入大别山，解放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就建立了中州银行。我就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工作。我们的职能就是发货币、收税款，还有管理金银。

国民党经常进攻，我们中州银行也要搬家，那时的银行说是银行，实际是开个小铺子。我们的银行住在农村大院里，撤退的时候，会计背账本，马车驮银元，甚至有时把银元先就地埋起来。淮海战役中，敌人为了摆脱困境，妄图打援解围进攻我们的军区，我们有个独立营保护行署党委、军区，和敌人绕圈子，行程数百里。平常有工作就干，没事就帮老百姓种地，砍柴，也很愉快。

八百里路送黄金

田毅：您刚才提到你们银行也去收税，当时解放区的税是怎么收的呢？

蒋黎，就是直接收啊。我们区（省）分行下面还有地区分行，还有支行。他们有税收后就交我们这里，我们再交到中州银行总部。税收来源主要有商人、小商贩和大地主。1948年9月，我刚来不久，组织就给我一个任务，叫我把金子送到开封去。

田毅：送金子？

蒋黎：对，大概是十斤金条和金块，装在背包里，一趟八百多里路，其中步行了三百多里。我们科长把我送了一段就回去了，后来我一个人走到河南许昌，再坐火车到开封，一路四、五天，沿途是新解放区，土匪猖獗。晚上就到老百姓家里住，白天就走个几十华里。有一次睡到牛棚啊，牛粪很臭，但是很暖和，睡了一晚。到开封后交了金子，又玩了一天，然后就走原路回来。那时胆大，坚强，也是幸运。

田毅：这个信念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呢？

蒋黎：这个就是国民党太腐败了，国家没有前途，必须建立新政府，建立新社会。那样一个社会，没有生产、没有物资、没有工业，什么都没有。就是疾病，四十岁五十岁都死去，这个社会能那样下去吗？！

统一财经两大措施

田毅：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您当时观察到了什么呢？

蒋黎：那时国民党的纸币不行了，成废纸了，都不要了，不值钱了。于是1949年发行金元券，到解放前夕也不行了。当时真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恶性通货膨胀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同样的钱，今天买头牛，明天一袋米，后天就是一根油条了。一天之内，早晚市价

都不同，百姓没办法生活了。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里曾写道，此时上海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 200 多万倍，这是个天文数字啊！

田毅：这个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还在中州银行江汉分行？

蒋黎：1949 年解放军渡江后，五月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武汉，武汉是 1949 年 5 月 16 日解放的，那时我还在江汉分行做基层检查。当时分行就通知我，你赶快直接到武汉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报到去——它就是当时湖北解放区几个地方银行的干部集中起来成立的。我 6 月 6 日到了汉口，被任命为会计室会计股长，12 月份转为统调科副科长，1951 年春天又任现金管理科副科长。解放后赶快要做的就是统一财经，不统一就没有办法收拾这个乱局。

田毅：但这个困难特别大，而且全国财经工作的经验也比较缺乏。

蒋黎：对。我们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统一财经工作。当时银行的任务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一开始重点有两个措施：一是现金管理。就是各单位都要作现金收支计划，核定库存；二是跟银元黑市做斗争，银元当时在黑市流动很猖獗，人民币发行了一点，但还不够。

这两项工作我都参加了，每一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要搞现金管理计划，每个月你收了多少现金，支出多少现金，都要搞计划，多余的钱必须存银行，库里有多少钱都给你定了的。做计划，搞检查，该处罚的就处罚，不客气。

单靠银元不行，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发行，打击银元黑市，把银元收回来，所以我们经常去查银元。1950 年初，我们曾经到湖北南部检查，遇到大量携带银元的就没收，非常强硬，打击黑市，要把银元的流通压下去。

田毅：当时还有折实存款。

蒋黎：对。银行还搞了折实存款，就是以粮食等为实物单位，比如一百块钱人民币变成十个实物单位，如果实物涨价了，涨到十五个单位，就给你十百五十块钱，保障你的存款不贬值。这个政策的力量大，收效很快。银行存款大量增加，如上海 1950 年 4 月的半个月，银行存款余额就增加了 20%，折实存款反而减少了 36%，物价就基本平稳了，还出现了半年期的长期存款。

在中央领导下，统一财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确保了“三平保一平”，“三平”就是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保一平”就是保持物价平稳。1950 年 3 月中央发布了十项规定，其中包括现金管理，一个多月后就见了成效，物价就稳定了。这些工作很有力，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国家一下子把局面稳定，统一财经工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毛主席说这是初战告捷啊，不亚于淮海战役。

田毅：物资方面的统一管理又是怎么搞的呢？当时确实是破破烂烂，统一物资不容易。

蒋黎：当时的商业在布匹、粮食、医药等具体方面都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全国统一调拨。光凭说话不行啊，得手里有物资。

物价平稳后，1951年后开始感觉资金紧了。就是统一的过多了，于是该统一的统一，该下放的下放。这就形成了分灶吃饭，哪些收入给当地，哪些收入给你采购，也开始搞独立核算了。这样，地方就考虑各地方的利益了。

信贷方向与挪用

田毅：那当时国家贷款是不是就开始有了倾向，比如重点支持国有经济，特别是重工业？

蒋黎：是有重点支持的，开始比如轻纺和重工业，但当时国有贷款很少。到了1953年，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确定了156个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就贷款多了。156个项目为中国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之后，银行全面发展，就不只是现金管理了，变成信贷、现金和结算三大中心。

田毅：有个阶段银行贷款变成了财政拨款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蒋黎：当时，银行的任务是支持流动资金，但有个阶段实际上变成了财政拨款，只贷不还。到1958年后发展到高峰，重复建设，浪费，挪用信贷资金严重，产生了较多的不良贷款，一直拖到改革开放后才动大手术。

1978年，蒋黎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这位1948年曾身背十斤黄金行程800里送至开封中州银行的老金融，又将开始怎样的历程呢？请继续关注《我亲历的两段金融巨变》的下篇。

田毅：您是哪一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呢？

蒋黎：我其实两次进总行，第一次是1954年要我到总行搞对外工作，参加学习，但检查出肺部有毛病，就回湖北治疗了几年。到了1965年春，我是“二进宫”，到了总行信贷局。在那里做过商业信贷、工业信贷。

田毅：您曾告诉我1978年您到了总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这个很有意思。

蒋黎：那是从总行各个司局抽调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规划金融体制改革的办公室。大概存在时间有3、4年，后来就改为金融管理司了，它的职能一方面是继续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对各家银行进行管理。

成立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背景是小平同志说要搞改革开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在这个大环境下总行按照中央部署，研究搞起体制改革。

田毅：这个阶段很重要，如当时就开始起草金融管理有关规章及《银行法》了，您都参与了吧？

蒋黎：都参与了。改革就是开创，一开始不清楚怎么搞，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金融信息，最后感觉不行，还是要做体制改革。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过去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行使商业银行职能，这个怎么办？当时工商银行都没从人民银行分出来，甚至曾经有段时间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都是人民银行下属的单位，大包大揽。

田毅：对，这个局面如何改革当时不容易。

蒋黎：当时可以说工商银行就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就是工商银行，合二为一，既搞金融管理也搞信贷结算、存款业务，这就不客观、不公正了，就可能亏待其它银行。所以，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过去承担的信贷和储蓄业务由工商银行专门经营。同时确定人民银行的分支业务实行垂直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理事会作为常设的决策机构，确定存款准备金等等制度。

田毅：其实在中国，机构设置是最微妙的，也是最费事的。

蒋黎：是的，当时确定人民银行要建设分支机构，不能只搞研究，这其中有过争论。

田毅：那么，这时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体制研究呢？

蒋黎：我们就是做调研，提建议，去跑几个大方向的题目。记得大概也是在1984年，我专门和体改委同志一起到德国调查研究过股票债券问题。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要重视市场功能，而债券股票就是市场的一个体现，依靠市场来调节，依靠本身来经营。

田毅：您曾经和我提过80年代初期，在一些会议上有人反映希望成立私人银行，这方面是怎么回事呢？

蒋黎：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要搞私人银行，特别是浙江，但当时整个市场的发育还不正常。那时，工商银行刚刚跟人民银行分开不久，我们去了浙江省调研这个问题，认为当时金融体制改革刚开始，贸然成立私人银行，如果掌握不好很可能发生挤兑，破坏金融信誉。之后允许各地设立城市信用社，后来纷纷改制为股份制银行，国家容易监督。

田毅：您在曾经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当时大中城市的金融机构相对少，反而是基层银行，比如县级的，反而较多，所以大中城市可以成立一些信托投资公司。

蒋黎：说它少，是说总数不多，当时只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几家银行。所以当时一个搞了信托投资公司，一个搞城市信用社。这两个发展起来，其实类似于地方银行。比如渤海银行，就是当时天津提出的。当时考虑如果搞地方银行，就怕管不住，所以还不敢搞。

田毅：80年代，虽然没有《银行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制定这个条例的进程比较快，您能谈谈吗？

蒋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1986年元月七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是中国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的金融法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对加强法制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先后制定和通过了许多重要法规。“七五”计划建议指出，“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调节经济运行。”

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了《银行法》起草小组，借鉴世界各国银行法，结合中国实际，拟定了中国的银行法讨论稿，但因当时金融体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定型而法律条文又必须强调稳定，虽历时多年，数易其稿，但仍感到很成熟，不能上报国务院审议和提请全国人大通过。

田毅：这个《条例》出台时，中国信贷资金起伏很大，市场不稳定。

蒋黎：对。1985年4月1日，国务院领导指示，要尽快地把银行管理条例制订出来，必须运用经济法规对金融事业加强管理。同年8月，中央领导再次指示。1984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信贷、货币曾一度失控，经济上出现不稳定因素。同时，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已分设，如何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各自的性质、地位，从而加强金融管理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制定《银行法》的条件虽不成熟，但制定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是完全有可能的。

田毅：《条例》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蒋黎：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条例》是中央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合一的雏型。《条例》对中央银行及其和专业银行的关系、专业银行、金融机构管理、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等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中央银行。”并规定了它的十二项职责。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允许成立和禁止成立的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是允许设立和发展的，并通过《条例》使其合法化。

田毅：蒋老，您刚才谈到了金融管理的分工问题，不知您对后来有关变化怎么看待？

蒋黎：我认为后来多年的银行监管体制大的方面是正确的，具体怎么管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比如银监会具体分工如何更加清晰。第二个重大改革就是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改革。商业银行搞股份制，依靠市场来调节，所以要剥离不良贷款，现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基本上完成了改革，农业银行还需要做一些工作。如果不是进行了这些改革，那么现在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就有些困难了。

田毅：但很多人担心，最近一年的巨额信贷将埋下很大的风险。

蒋黎：我想，国家拿出几万亿为应对金融危机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而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但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银行都要转向商业银行，政策银行在转，农村商业银行也都想往这方面发展。这个方面我认为需要好好的引导，好好管理。总体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要继续坚持大方向不动摇。但另一方面，一些具体政策是可以微调的。特别是要把发展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往调整和创新方面使劲，防止产生产能过剩及引起金融风险 and 潜在的通货膨胀。

讲述者：蒋黎（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金融管理司副司长。访问者：田毅（FT 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2009-09-03

FT 中文网实习生韦凌云、安丰雪、谢思娜对本访谈亦有贡献；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元勋后代忆述开国大典鲜为人知故事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新中国的缔造者的丰功伟绩彪炳千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的神奇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香港《镜报》月刊 10 月号刊文《建国元勋后代忆述开国大典》，专访数位开国元勋的子女后代，忆述六十年前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文章摘编如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广场的 30 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时隔六十载，许多开国元勋的子女对开国大典那一刻依然记忆犹新，每每谈及，不禁激动万分。

毛泽东之女李敏：耳边常响爸爸宏亮声

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今年已是 70 多岁了。她对记者说：“我是 1947 年从苏联回国的，1949 年开国大典时我 12 岁，和爸爸住中南海。开国大典那天我心里特别激动，我知道这是国家的大事，小孩子不应该跟着去。但我心里特别想跟着爸爸上天安门，又不敢说，小孩子不敢提任何要求。开国大典下午 3 点开始，我就在中南海听广播，在广播里听到爸爸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特别高兴，心里想我们的国家从此就强大富裕起来了。”

“晚饭前，爸爸从天安门城楼回到家，休息了一会儿，晚饭过后，就带着我们又从中南海出去，去天安门观看礼花。晚上 8 点，五颜六色的礼花开始在空中放起来了，我坐在爸爸身旁，不时拉着爸爸的大手说：爸爸，快看，这像什么花，那像什么花……。”

李敏说，开国大典这一重要时刻已被加载史册，我后来在电影纪录片中看到大阅兵的场景，看到爸爸魁梧的身躯，宏亮的声音，内心的骄傲自豪就别提了。多少年来，爸爸那宏亮声音时常在我耳边回响。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英姿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直到现在，我每经过长安街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爸爸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想起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的那一幕。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鲜为人知的大典细节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是中国新闻社的原副社长，担任过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谈到开国大典，周秉德兴致勃勃向记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她说：“1949 年，我 12 岁了，就住在中南海伯父那里。9 月 1 日我刚刚上中学，为迎接开国大典，学校除了正常的课程外还安排了国庆游行的准备活动。我们唱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等红歌。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五角红灯，每天课余时间练习红灯舞，那时，我就盼望 10 月 1 日早早到来。”

“周末回到家时我看到，伯父为筹备开国大典，整天都在忙，开会研究事情，人来人往不断。我们小孩子不打听，伯父也不和我们说开国大典的事情。后来我听说一件事情，至今难忘：毛主席与周总理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多少年来，两人出现时，都是主席在前面走总理跟在后面，总理从来没有走在主席的前面。但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就在两人马上要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伯父第一次快主席一步抢在前面，他对播音员挥手示意，毛主席已经来到天安门城楼了，让播音员马上播报。播音员立刻广播：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已经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几十万人齐声欢呼，一片欢腾。”

周秉德回忆：10 月 1 日那一天，我们都提前吃了午饭，排队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建国成立大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早早就到了广场，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的几十万人顿时欢呼，互相拥抱、泪如泉涌、大家不停的喊呀叫呀，唱呀跳呀。等到阅兵开始时，我看到天上的飞机就更兴奋了。我们游行结束已经是黄昏了，我们就手举着红灯，一边走一边跳。开国大典是我 12 岁以来参加过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次活动。

周秉德说，开国大典当天，政府官员需要先在中南海宣誓，然后再去天安门。为了准确计算时间，伯父还亲自测量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时间，经测量得知，这段路程需要 35 分钟。开国大典是下午 3 点开始，所以他安排就职宣誓两点开始，2 点 25 分前必须结束。9 月 29 号，伯父又到天安门城楼检查毛主席休息的位置是否安全，广播员的位置，播音器材好不好，国旗旗杆的高度，升旗按的电钮灵不灵，等等。伯父还考虑到年长者登上城楼，需要年轻人搀扶，需要担架抬等问题。伯父就是这样一位非常细心、周到的“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

朱德之婿刘铮：心中敬仰的“朱爹爹”

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元帅，在党内、军内威望极高，他是中国军队的缔造者，永远的总司令。记者日前采访了朱德元帅的女婿刘铮老人。谈及 1949 年的开国大典，82 岁的刘铮老人说，那时，我刚 22 岁，我是第一批随王稼祥大使赶赴苏联组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可惜没有在国内亲眼看到开国大典仪式，但我对这件难忘的事情记得最清楚。我们在苏联组建大使馆，也是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刘铮一直亲切地称呼朱德为“朱爹爹”，心中充满敬仰之情。他说，1952 年底，我和朱爹爹的独生女儿朱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1953 年我们回国后，听朱爹爹给我们讲起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的意義。朱爹爹说：“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容易的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老百姓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要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你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努力工作为国家创造财富、建立新功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北京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朱德还担任开国大典大阅兵司令员。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并报告说：各军种已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德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然后又回到天安门上宣布：“阅兵式开始！”当时朱德总司令兴奋地说：“十八年前，我们红军在江西瑞金举行过一次空前规模的阅兵，十八年后，我们又在北京天安门阅兵了。十八年啊，今非昔比啊！”这位戎马一生的总司令感慨不已。

贺龙之女贺晓明：今年妈妈要上天安门

采访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时，她高兴地说，妈妈薛明今年已经 94 岁了，她已接到邀请，今年六十年大庆时将要上天安门。十年前，妈妈在祖国五十年大庆时曾上了天安门。开国大典时，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英姿已定格为历史，如今，妈妈再次上天安门观礼，这是对爸爸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和女儿贺晓明等人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女儿贺晓明细心照顾着高寿的母亲。贺晓明柔和的面容上总是挂着弯弯的笑容，总是微笑的神态，简直和父亲贺龙元帅像极了。

她对记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是我心中最大的节日。我对共和国的感情特别深厚，我们的父母打了二十多年的仗，就是为了建立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粟裕之子粟戎生：身着戎装戎马一生

采访开国大将粟裕之子粟戎生是件快意之事。这位将门之后，快人快语，短平头，军便

装，十足军人作风。六十周年国庆前夕，记者再次采访粟戎生，他仍是一身戎装。家中摆满了各种兵器模型，从枪械弹壳、飞机坦克到火箭导弹，还有许多粟裕将军的塑像和图像，以及指挥军刀，整个家都散发浓浓的军旅味道。

粟戎生说，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爸爸还在华东前线指挥打仗，后来接到毛主席的命令，让爸爸立即率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爸爸高兴极了，他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在9月30日晚上，参加了人们英雄纪念碑的奠基铲土。10月1日，爸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那个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时，爸爸身兼华东军事要职，因此，他一边在北京开会，一边指挥前线的军事，在参加完这些重大活动后，爸爸又回到南京，继续指挥解放浙江海岛等诸多战役。

粟戎生说，那时我们全家都在南京，没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1951年，爸爸奉调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我也来北京上学了。记得1955年国庆前夕，全军开始授衔，爸爸授衔大将，他穿着崭新的将军服，10月1日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三军官兵，真是威武极了。令我难忘的是，那天，我作为北京的中学生，也参加了国庆大游行，我们跟在军乐队后面，经过天安门时，我们高兴得又喊又叫，喊哑了嗓子，我多想让爸爸看见我呀，可是人太多，谁也看不见谁。

陈赓之子陈知建：主席的手又大又温暖

开国将帅陈赓大将的战功卓著，中外闻名。陈赓的儿子陈知建也是军人，退休前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作为军人，陈知建将军非常羡慕父亲传奇般丰富的战争经历。

陈知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国大典时，我爸陈赓没能上天安门，那天他正率领大军在广州进军云南的路上。我爸从山东打起，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参加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后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进军广东，直插雷州半岛。1950年初，我爸进驻昆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那时我5岁，来到昆明，我才第一次看见城市，第一次进了电影院，第一次进了校门。”

“1950年7月，我爸应邀至越南，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1951年我爸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我爸是出国作战最多的将领。”

陈知建回忆道：“1951年，我爸带我们从云南转到重庆，再乘船到武汉，最后到了北京。1951年国庆节，我爸第一次上了天安门城楼，并观看了国庆大阅兵。令我难忘的是，那天晚上，我爸带我上天安门观看烟火时，在天安门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心情特别激动，毛主席和我握手，哎呀，那只手又大又温暖，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已经五十八年过去了。”

谈及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感受，陈知建爽快极了：官话，套话，不说了，就用主席的一

首诗概括吧：“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掘井人。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立下丰功伟绩的开国元勋将帅们。(中新网 9 月 23 日 淮黎霞)

三种前景：中国未来 30 年 刘吉

摘要：2009 年以后的 30 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最后“左”派上台；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但概率大不同：第一种是 90%，后两种各为 5%。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 年以后的 30 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期间，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第一种前景：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

2.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 2%，西欧约 3%，日本也在 5% 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业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和企业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的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惟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一方

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下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什么是科业化？

21 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为社会主导产业、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而只有“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即使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各自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 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 30 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保证了中国高

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形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但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是在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造就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功能分工制”。其要点如下：

（1）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

（2）中央政府统管一切政治权力，即掌握军事、外交、公安、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器，确保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由于宏观经济兴衰关系政局和社会稳定，因此宏观经济调控也属政治权力之列。

（3）地方政府职能主要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等，以创造优良的地方经济发展环境。

（4）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主要功能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广泛发展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实行人民自治的各项文化和道德建设活动。

5. 共产党改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 13 亿人口、文化传统深厚、经济基础薄弱、国土辽阔而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先进的领导核心，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不断地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中华民族要实现自己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这个领导核心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它。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领导了 30 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今后 30 年还要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使命。历史责任极其重大，历史任务极其艰巨。现代化事业要求现代化的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作为领导的共产党也必须改造自己。首先要彻底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党。

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和如何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党不会犯重大错误，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保证党不会蜕化变质，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上述，具体重点应建立下列机制：

(1) 人民群众推荐党员、监督党员和罢免党员。共产党发展党员必须经过所在支部的群众推荐，或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得到所在支部群众半数以上的同意。群众推荐虽然不一定能推荐出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德才兼备的人才，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同意坏人、小人入党。若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有一半群众不同意，至少说明他联系群众不够，也应等他改正这一重大缺点后才可入党。罢免党员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人民群众有推荐权和罢免权，才有真正的监督。

(2) 提高党员质量水平。党员条件中除现行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政治条件外，应加入若干有具体可操作、可考核的内容。例如，共产党员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无条件地无偿献血和捐献骨髓移植。没有两次献血记录或拒绝骨髓移植者不得入党或党员除名；党员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逝世后必须无条件贡献遗体，供医用器官移植，对人民作最后贡献，等等，这才叫和平年代“与人民血肉相连”；再如党员必须站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前列，当人民群众受坏人侵害而袖手旁观者，立即开除党籍；党员遗产中一半捐给慈善事业，等等。党既然是“三个代表”，因此对党员的文化程度也必须有相应要求，文盲和高中以下文化、读不懂《共产党宣言》者不得入党。文化不够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先补文化。

(3) 基层支部和党委领导，必须由党员自由地民主直选。县以上党委是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必须是基层党委直选。党委候选人必须不等额，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政见竞争，经代表充分自由的评议后无记名投票。县以上党委成员必须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4) 各级党委实行民主科学决策。必须事先予党委成员同等信息，充分自由讨论、无记名投票后真正保证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后必须多数尊重少数。必须用党纪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力，一切通过实践检验。及时反馈实践结果，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各党委成员在党委决策中的态度和见解，必须记录在案并通报下级党委和相应的党代表，让党员了解领导、选择领导。

(5) 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应成为民主科学决策的模范。应有更严格的民主科学机制，在政治竞争中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择。

(6) 严格党内监督。党的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贯彻；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行为；对公检法党委及其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公正执法。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独立执行任务。

要言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参加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科学机制选拔各级领导和决策，从而保证共产党不犯重大政治错误和蜕化变质。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通过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从政治体制上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今后 30 年实现伟大复兴。

二、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左”派上台

“左”派前 30 年来一以贯之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根本对立。他们有时自称不反对改革，而是要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 30 年的实践证明：他们除了不断用前苏联和 1957 年以来特别是“文革”大批判的观点不断批判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外，未见一项像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议。他们长期利用网络乃至若干传媒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责基本小康下的收入差距是“两极分化”，把中国和平发展前进中的不足，如医疗、读大学、住房等困难，丑化为“新的三座大山”，一句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呼应海外右派不时刮起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什么“旋风”。

当代中国的“左”派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1) 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善于引经据典，背诵经典文献词句，就是不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结合，不能也不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2)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贯彻者。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它反映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平均主义分配、帝王个人崇拜、崇尚暴力斗争等。一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封建主义，至少是混杂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怪胎。

(3) 坚决全面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无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因此虽然十分坚决，也只是维护封建主义失去的天堂。

(4) 主张阶级斗争为纲到底，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争取和谐世界。

那么，这样的“左”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清算，为什么 30 年还没有绝种？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左”派的迷惑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号，颇能迷惑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的年轻人。他们制造出“草根”、“弱势群体”的理念，以代言人自居，宣扬小生产意识，颇能迷惑一些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他们挑剔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颇能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群众。

(2) 共产党内宁“左”勿右的传统影响。某些建党理论始终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教育问题，右是殊死斗争问题。这个传统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其实，“左”右在初起时都是认识问题，经过多次反复教育而不改，都必定是立场问题。

(3) 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仍有 62% 的农业人口。许多城市工人乃至知识分子刚从农民阶级转化而来。党和国家干部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农民子弟。如此巨大的社会基础正是产生“左”派的温床，也是“左”派观点传播的市场。

(4) 利用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宽容，与党进行“合法斗争”。设想一下，如果“左”派上台，中国将是什么局面？

重搞阶级斗争，推动世界革命。重操他们熟练的“文革”式宣传，大规模揭露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和个别阴暗事实（如官员腐败、富人荒淫）。抓住一点，上纲上线，血泪控诉……顿时搞乱社会舆论和价值理念。于是在“纠正市场经济错误”下，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在“公平”、“共享”的名义下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等等，引起某些“草根”、“弱势群体”狂热欢呼。由于当今中国人均 GDP 已超过 3000 美元，人民生活已基本小康，外汇储备二万多亿美元，一句话——改革开放聚集了相当的社会财富，足够“左”派折腾几年。

但是“左”派上台寿命绝不会长的。在社会混乱下，外资必将迅速撤离，广大企业主和社会精英不断大规模外迁，最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败光，中国人又回到共同贫穷。共产党又一次错过人民给予的机会，人民不再谅解共产党了。于是，中国必将出现“叶利钦式”的“英雄”，推倒“左”派统治，同时埋葬共产主义。天下大乱，可能要延续许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再一次丧失！

三、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

右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声望降到冰点，社会道德沦丧，他们对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他们发现过去“左”的舆论宣传的欺骗性，看到一个“世界多奇妙”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向往地五体投地。他们赞成改革开放，但是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右派的特点是：

(1) 崇拜和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不甚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无不经历过漫长的对外侵略（殖民）、对内盘剥的历程。迄至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既得优势，攫取或榨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美国占用世界 42% 能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来获利。放眼全球，除极少数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处在贫穷和愚昧之中。他们更不了解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特别北欧各国，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声的资本主义。

(2) 没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创意，只有简单的照搬。中国如何搞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他们天真地以为照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就会立即享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完全无视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 屈服于国际资本主义压力，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是海外资本主义软实力的应声虫，传播或响应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创新”的观点。甚至有的与外国一些反华组织有这种或那样的联系，制造事端，靠海外舆论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那么，右派能够取得成功吗？

“崇洋迷外”是小生产意识的另一面表现。因此，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也是右派的社会基础。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人生观不成熟、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成为右派观点自由泛滥的市场。这就是现实存在的“和平演变”。对于这类“和平演变”，加强有说服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而根本途径和最终解决必然是依靠中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必将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产生不可阻挡的“和平演变”的威力！

同样可以设想，在今后 30 年中，右派若要成功可能会有两个机遇：

(1) 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小生产意识影响下，不锐意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受阻，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中国发展速度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以用历史来说明；中国发展速度低于崛起的新兴小国，可以用“烧一杯水比烧一锅水容易”来解释。但是，如果发展速度低于资本主义复辟了的俄罗斯，或“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中国的政局就绝不可能稳定了。右派必然受到人民拥戴，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

(2) “左”派折腾的结果，必将导致右派胜利。“左”派在善良的人们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但斗不过右派。最后，前述“叶利钦式”的“英雄”将在人们埋葬共产主义的欢呼中登上执政的舞台。右派上台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但中国绝不可能达到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富强的国家。经济上在动乱中无法发展，社会真的两极分化、动荡不安，政治上只能是国际霸权主义的附庸。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只能等待人民新的觉醒和革命，等待新的邓小平。

结论

上述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是可能的，但可以预见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形象地说，第一种情况的概率是 90%，后两种概率各为 5%。

为什么第一种情况有 90%这样巨大的可能性呢？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族历史性的心愿。人民的历史要求是不可阻挡的。

(2) 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 30 年，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真理性。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充分反映了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 30 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4)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又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持续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改革尚未完成，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天地。

(5) 30 年改革开放重建了中国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威望。党也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和丰富经验完成新 30 年各项历史使命。

(6) 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素质将不断提高。全民族知识化，首先是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化，将对中国前途做出理性的最佳选择。

(7) 今后 30 年全球化和平发展，霸权主义成为人类公敌，中国有可能运筹应对，保持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中国建设发展。

那么，对于低概率的后两种情况，是否是不必要的多虑？是危言耸听的空谈？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呢？答案是否定的。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人们掉以轻心，概率很小的事件也会看似偶然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胡锦涛同志及时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告诫全党全民还是有动摇、有懈怠、有折腾的情况存在，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时刻警惕、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左”右折腾不得。邓小平的政治遗言，“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我们要时刻牢记在心，至少还要记住 30 年！

只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今后 30 年可贵的历史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选自《高层内参》2009 年第 31 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